

小草扎根

口述 全国政协委员 王召明 整理 本报记者 高志民



王召明(中)在野外采集种质资源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鸟儿唱，一弯碧水映晚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

无论我走到哪里，这动人的旋律总在我耳边回响。美丽的草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一生倾情付出的地方。

从1994年大学创业开始，28年间我一直没离开过草原。我觉得我更像一棵小草，看着不起眼，但一直在努力成长。收集、研究、保存、繁育、推广野生乡土植物，建设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小草诺亚方舟)，现已有200多种适地适生的植物应用到草原、矿山、湿地等生态修复项目中，累计修复面积近3000万亩。

从一个草原放羊娃到建立生态科技种业企业，我每一步的成长与发展，都受益于、也感恩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如今我们正用“特色种业+小草数字”精准修复生态的治理模式，用一棵小草完成生态修复、带动生态产业、农牧民增收致富。

我是草原放羊娃

我从小生在草原、长在草原，七八岁就开始放羊。家里兄弟姐妹六个人，并不富裕。

好不容易考上了内蒙古农业大学，学费却成了问题。我只好背着200多斤羊毛到集市去卖。一次背不动就分两捆，往前背一捆放下，返回来再背另一捆……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天才坐上客车到集市卖了羊毛，凑够了学费。

1994年，我上大学二年级，为了生活和学费，我开始蹬三轮车卖花。为啥想起来卖花?当时学校的温室培育了一批仙客来，5元钱一盆向外批发，在外面能卖8元钱。那会儿我也没有本钱，就找人赊账，借了个三轮，早出晚归，走街串巷……

等到毕业时，我已开了3家花店、有20来名员工。那时候呼和浩特才6家花店。

我还记得，有个星期天，一位妈妈带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来店里看花，我热情地给她们介绍了店里的花，还有养花的知识。讲完之后，她们也没买，我把她们送到门口，这时这位妈妈却突然拍了拍我说：“丫头你一定要好好好学习，不然以后长大了就会像叔叔一样卖花卖草!”

其实，卖花卖草在大多数人看来不是个“正经”营生，是个受苦的差事。但我慢慢地做出了乐趣，也有了心得。

我们总要给子孙留下点什么

我发现，当时城里美化绿化的花草草都是进口的，常浇水、总打药、勤施肥，可一旦伺候不到位，不是草枯就是花落。

可是，我小时候放羊，草原上的那些野花野草，每年只要能有三两场雨就长得很好。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到下雨天，母亲就要炒几颗鸡蛋，父亲有滋有味地喝一顿小酒，我们这些小花娃，就在院里撒欢。为什么?高兴!即便是大旱的年头，也没人给他们浇水施肥，但是来年的春雨春风又让花草生机勃勃。

我就想，是不是能办一家公司，让我们自己本土的花草用于绿化。于是就有了现在公司的前身。

绿色资讯

lvsezixun

今年上半年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9%

本报讯(记者 王嵩娟)记者18日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仍呈持续改善态势。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9%，优良水体比例同比增长了1.1个百分点。

2020年国家统计局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达到了89.5%，比2017年提高了10.7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成效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全国政协常委、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发布会上表示。

黄润秋说，“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九项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全面圆满超额完成，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

这些年，我按这个思路，带着团队到那些干旱的地方、矿坑里、沙漠中、山头和边坡上，找那些大旱后还活着的，大冷天还绿着的、能活好几年还怕踩的花花草草，把它们的种子采回来，在我们的小草之家保存、研究、繁育，再用到草原、矿山这些个国土绿化上去。“蒙草抗旱”慢慢就叫出去了。

2007年，我又开始琢磨能不能把这些野外的花草树木都收集起来，建一个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以后一查就知道哪个地方能长什么，什么植物能长在哪里。

最初很多人不理解，即使公司很多高管都觉得公司规模也不大，一个民营企业折腾一个不赚钱的事情干什么?而且这么“高大上”的科技项目，国家系统里有那么多专业研究院，你一个民营企业，缺人缺钱咋能做成?

我就组织大家开了个会。我问大伙，50年后你们在哪儿?他们说估计都不在了。我再问50年后公司还在不在?他们有人说不知道。我继续问：那50年后我们收集的这些植物、种子还在不在?他们说应该都还在，也还能种。我说“小草，争的不是高低，是生生不息”，我们总要给子孙留下点什么。

于是，就这一件事，我坚持做了28年。从花店的花花草草到研究大自然的的花花草草，我们把于旱半干旱地区有地理标记的植物种子/标本10多万份、土壤样本140多万份，收集保存在一个叫“小草诺亚方舟”的地方，长期库中能保存种子活性50-100年。

那些为小草奉献的人

这期间，我和团队走遍内蒙古、新疆、西藏、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在风里、雨里、山野里、沙漠里，年复一年的采种、收集、保护选育各种植物，发生了很多故事让我十分感动。

我们草原生态系统研究院院长、70多岁的老专家、草原老知青那旗老师，年复一年守在乌拉盖草原，采种、观测、治理暗沙带。

草原上的天，往往风雨无常，这会还36℃大太阳晒的不行；一会暴雨又来了，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唯一有的

就是一个草帘子搭的小窝棚，还挤不下那么多人。饿了啃一口干粮、吃一口泡面，早晨4点多天蒙蒙亮出发，晚上10点才能回去，还得抓紧时间整理科研数据，可是他这一守就是几十年。

年轻的科研人员赵书，刚毕业就一头扎在西藏，一干就是5年。采集土、气、一株草一株花地采，慢慢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建了当地的资源圃，一点一点把西藏海拔植物种质研究体系建立起来。

这些年，我们在内蒙古、西藏、陕西、青海、新疆等国家重要的生态区都建了研究院、草种繁育基地。我们的研发基地、生态项目里也有很多当地的农民、牧民，尤其是我们租了地的农户，每年都参加采种子、标本、水样土样，在资源圃里搞研究，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成了我们最接地气的“小草科学家”。

跟自然接触多了，包括研究草种、研究生态的时候，没有诀窍，尊重自然规律最重要、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想着把这里的种子、植物、动物、山水林田湖草沙搜集起来，把这些融到我们的基地里。

现在，我们全国十几处科研基地都是免费开放的，有的就是一个生态大公园，小学生们能来体验、参观；有的就是自然博物馆、大学生、研究生能来实践教学、开展课题研究。像我们在和林的草博物馆、大青山底下的种业中心、西藏的高海拔植物研究基地、陕西的三秦植物种质科研基地，每年都有大量的人来学习自然知识，学习尊重自然、懂得自然。

像小草一样扎根

常有人问我说有啥理想，我说从放羊娃到现在，理想都一步步实现了。可我最初想的还是研究这些花花草草，这是初心也是使命。我还是要沉下心来，在党和国家的引领下，做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草种离不开草原，有时候草原上夏季有旱灾，冬季有白灾(雪灾)，我们就免费开放公司的大数据系统为牧民发送防火、防雪灾预警，指导他们及时预防。

2017年东部几个牧业盟遭遇“白灾”，牛羊的饲草料严重短缺，交通也中断，市场上牧草价格暴涨，有的翻一番还多。我们公司当时和蒙古国正在做天然牧草贸易，手里头有个3万多吨库存。经营团队说我们的好市场好时机来了，今

年价格高能盈利不少。

可我是放羊出身，受苦人的难处我知道，我说咱们不能涨价，这个时候涨价就是趁火打劫，但是便宜卖了又是扰乱市场秩序。我说那干脆就捐了吧，牧民有困难了，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批牧草就捐给了10个受灾牧业旗县。

特别是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我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上呼吁加强草原种业保护。

2013年，我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在北方生态环境建设中加强乡土植物应用》的提案，希望大家重视乡土植物的重要性；

2016年，建议国家在重点生态建设工程中增加草种基地项目；

2019年，我呼吁应该加强特色种业的保护与应用；

今年两会上，我建议建立国家特色种质资源库和数字化应用体系。9年的政协履职，我一直都在关注乡土草种、特色种业，一直在想、在做、在摸索，怎样才能建起我们自己的种质资源库?能不能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让种子保存得更全更好、利用得更快更便捷?

记得2015年9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第5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我作了题为“利用现代科技保护草原”的发言。发言中结合自己成长经历和企业实践经验，提出草原保护要建立和利用好草原植物种质资源库和“草原大数据”，要有标准和方法、要学会与草原对话。这个发言内容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认可。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视察蒙草公司。当时，他嘱托，无论是农业还是牧业，都要依靠科研，找一些当地适合的品种，要走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乡土植物开发推广应用及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在讨论环节，他特别嘱托蒙草要做好我们自己的草种业，做好特色种业。

如今，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走符合自然规律的、符合国情、地情的生态发展之路，扎根草原、守望绿水青山，像一粒小草的种子，扎根、扎根!

【王召明系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员声音

日前，笔者在读当地主要媒体头版时发现一条新闻：某县发现国内最大规模某种野生珍稀植物居群，文中详细地报道了这个居群的所在位置“***乡***村***自然村”“***山场的公路北坡至坡底水沟边”。看完这个，笔者心里一沉——老子在《道德经》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告诉野生珍稀植物的详细所在，难道不会引发风险?

果不其然，我把这条消息发给两位朋友，一位平时喜欢侍弄花草的朋友看后，他开玩笑说，什么时候按“地”索骥去挖个几株来养养；一位是林业部门的丁科长，“业内人士”看完后，迅速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里面只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义务，而没有明确的“加密”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的措施要求。

笔者将丁科长和农工党市委办公室主任陈炯一起组建一个微信群，对这条线索开展进一步调研后，发现：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一些珍稀动植物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但在公布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时，不少媒体及刊物都详细或较详细描述了物种采集地的信息。可这些“信息”会给它们带来灭顶之灾。

首先，易诱发偷盗。近年来，偷盗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比如，2020年，重庆破获一起网络非法出售濒危鸚鵡案，查获保护动物300余只；2021年4月2日，广西北海有一村非法盗采国家级濒危珍稀植物二级保护植物金毛狗蕨。在一定程度上，公布珍稀物种采集地详细地址，相当于为犯罪分子明确了偷盗目标。

其次，公布详细信息可能致使它们被过度采集至物种濒危或灭绝。1994年，科学家发现了东南亚的麦氏长颈龟和新几内亚长颈龟的区别，将其独立成种。到1997年，就因人类的采集而极度濒危。1999年，有外国生物学家在广西喀斯特地区凭祥市一山区发现一新物种，并命名其为“凭祥虎”，研究者发表论文并公布了标本采集地。几年后，另外一位研究者重返这里，发现此地每一块石头都被人翻遍，“凭祥虎”已绝迹。这样的例子，在珍稀动植物的领域内屡见不鲜。

再则，公布详细信息可能为非法贸易提供供货渠道。近年来，珍稀动植物及其制品走私犯罪日趋隐蔽，但我国近10年来仅海关公布的非法野生动物走私案件就涉及多达109种野生动物。

事实上，一些地方与机构已认识到“保密”的必要性。2014年，我国研究团队在《动物分类学》上发布了一个两栖动物新种高山棘螈时，首次不公开采集地，保护高山棘螈不被标本贩子和宠物贩子骚扰。

因此，笔者认为，采集地详细信息的保密工作，是保护好珍稀动植物的关键举措之一。为此，我们迅速撰写一条社情民意信息《建议分三步“加密”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提交相关部门。

第一步，明确不得泄露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建议由国家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及中宣部联合发文明确，在各类新闻媒体、学术期刊上发布有关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新闻或学术论文等，不可泄露采集地详细信息。对采集地的描述只可至县一级或自然保护区。同时，明确责任追究，对因泄露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而导致珍稀野生动植物损害的个人或单位，视损失情况予以责任追究。

第二步，删除已公布的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建议由中宣部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限时整改行动，对近5年内网站、微信公众号、各类App、学术期刊电子版等曾发布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的，均予以删除，统一采集地信息为某县(区)或自然保护区，及时止损。

第三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条款中增加“禁止公布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信息至县级或自然保护区以下”；同时明确泄密后须承担的法律后果。

笔者所在的水南市是全国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物种多样性居全省之冠，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2020年以来，丽水市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等工作，发现了一系列新种和新记录，如发现大型真菌中国新记录种64种、浙江省新记录种263种；发现了两栖纲角蟾科新物种百山祖角蟾等。

然而，在公布珍稀野生动植物信息时，不少媒体及刊物都描述了发现地的详细信息。如：2020年10月《丽水首次在保护区外圈拍到黑熊……》提到，布设在九龙山保护区廖坑松坑岗的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了两张黑熊的照片……诸如此类消息令我们深感忧心，因此，我们随之提出，《建议我市率全国之先出台“加密”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办法》，目前，此建议已提交相关部门。

(作者系浙江省丽水市政协委员)

动植物也需要「隐私保护」

沈绍春



山水田园入画来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上山村以垃圾分类为切入点，全力打造美丽乡村，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村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及美丽经济的支撑点。图为上山村藕田与村落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本报记者 齐波 摄